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八編 第十冊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上)

郭萬青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0 冊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上)

郭萬青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上)／郭萬青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序 4+ 目 2+21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第 10 冊)

ISBN：978-986-322-618-5 (精裝)

1. 國語 2. 研究考訂

011.08

103001307

ISBN-978-986-322-618-5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 第十冊

ISBN：978-986-322-618-5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上)

作 者 郭萬青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十八編 22 冊 (精裝) 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上）

郭萬青 著

作者簡介

郭萬青，山東寧津人，1975年生。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畢業，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畢業。現任教於河北省唐山師範學院。著有〈《國語》動詞管窺〉、〈《國語補音》異文研究〉、《論語》（編譯）等書，發表學術論文六十餘篇。近期主要從事唐宋類書徵引《國語》資料的研究、《國語》研究史的研究與《國語》勘校詁正研究。

提 要

本書主要對《原本玉篇殘卷》、玄應《眾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切韻》與《唐韻》殘卷、《說文解字繫傳》、《宋本廣韻》、《宋本玉篇》、《集韻》、《類篇》、《韻補》、《六書故》、《古今韻會舉要》等小學要籍中引用的所有《國語》引例進行了斟證。在參考小學要籍較早版本的基礎上，參考小學要籍的各種版本以及相關的校勘成果；同時參照《國語》的各種版本和重要的類書以及群書引《國語》資料進行對勘比較。每一條《國語》引例的辨正都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引小學書各本進行辨正，確定各本引例之是非；（二）以《國語》各本和類書、群書引《國語》資料和引例進行比較，確定小學書引《國語》例與今傳《國語》各本之是非；（三）對相關引例中的有可討論之處的文字、詞語進行文字字形上的辨正和語義疏通與訓詁；（四）凡涉及《國語》舊注之處對《國語》前後注釋的異同原由進行探討。所附〈甘肅藏敦煌殘卷《國語·周語下》校記〉是對《國語》的早期傳本進行的文字、訓詁的校勘，可藉以瞭解韋注之外其他注本的吉光片羽並有助於今本的比勘。整體而言，本書可以為《國語》和相關小學要籍的進一步整理與研究提供借鑒與幫助。

自序

最早有這樣一個計劃是在讀碩士的時候，但是全面展開則是 2007 至 2010 這三年之間。關注的主要對象是《國語》，由於感覺自己的學力不足，難以立即進入文本本身的研究，所以就打《國語》的外圍，從群書引《國語》例入手，其意義已經在引言部分中談及，而且這樣做可能更容易發現一些問題。這樣的外圍工作其實談不上什麼研究，祇是花費時間鈔綴了一些資料，或許對於涉及到的幾部小學書的進一步整理和研究有些用處，對於《國語》的整理和研究也有些用處。本書的主要部分已刊諸《敦煌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漢語史學報》、《東亞文獻研究》、《人文中國學報》、《長江學術》、《中國俗文化研究》、《鹽城師範學院學報》等刊物，感謝刊物匿評專家的意見和建議，同時也感謝在本書寫作過程中始終給予幫助的蕭旭先生，蕭先生不但慨賜各種資料，還在研究過程中提供了很多修改意見和建議，使之減少了不少的錯誤。俞志慧教授研究《國語》有年，有珍稀資料卻不珍之如秘，慨然惠賜，實在感謝！海內外的一些師友等在資料方面也幫忙不少，一併深致謝忱！〈甘肅藏敦煌寫本殘卷《國語·周語下》校記〉在寫作時得到牛龍菲教授、蕭旭先生、蕭瑜教授的幫助，也表示感謝，此文發表之後發現有些疏漏和錯誤，今茲修訂一過，附於書末。原擬書名作「小學要籍引《國語》例辨正」，現定名為「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

我資質愚鈍，生性懶惰，讀書也遲，知學也晚，畢業後忙於工作，又置身偏遠，信息閉塞，更復難言向學。但我的碩士生導師王志瑛老師經常關心我的學業，時時郵件激勵。2010 年秋季，又蒙方老師不棄，列入門牆，遂負笈南京，隨從問學，仰承教誨，獲益良多。我本魯人，不通禮數，性復木訥，

寡少言語，四方師友不以爲忤，仍多激勵提攜，或通音問，或惠賜資料，乃未墮其向學之心，仰寶山之富，羨廟堂之美，雖久未得其門徑，輾轉徘徊，亦未嘗忍棄去，日積月累，得以成此，卑之無甚高論〔註1〕，實敝帚而自珍。權當做我學習過程中的一份作業，請師友們批評指正。

我作爲修習傳統學問中一個小門類的一名沒有什麼長進的小學生，很是感謝四方師友的幫助，並希望自己能一直努力學習，能夠繼續向師友們交上一份份的不成熟的作業來請指教。

引錄馬一浮（1883～1967）《泰和會語》兩段話如下：

但願諸生亦當具一種信念，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養之深切必要，信吾國學術之定可昌明，不獨要措我國家民族於磐石之安，且當進而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而不致有爭奪相殺之事。具此信念乃可以講國學。

諸生欲治國學，有幾點先須辨明，方能有入：

一、此學不是零碎斷片的知識，是有體系的，不可當成雜貨；
二、此學不是陳舊呆板的物事，是活潑潑的，不可目爲骨董；
三、此學不是勉強安排出來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於機械；

四、此學不是憑藉外緣的產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視爲分外。

〔註2〕

馬先生的話是在抗戰時期講的，在今日或尤顯示出其意義與價值。

本來，這部書擬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延宕三年，到今年上半年，網上已經公布了出版信息，但最後仍舊擱淺。又經朋友之介，轉入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文稿修訂完成，又蒙方師審讀一過，是正訛謬不少，深

〔註1〕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四「卑之無甚高論」條云：「《史記·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句）無甚高論（句），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野客叢書》亦謂卑之、無甚高論是兩句。今作一句讀，解作所論之卑下而不高，上下文義如何聯貫？」（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陳抗點校本，第138頁）本處所用之「卑之無甚高論」即杭世駿所謂「今作一句讀」者，也即《漢語大詞典》所謂「後用來表示見解一般，沒有什麼獨到之處」之義。

〔註2〕見馬一浮《泰和會語》之「引端」與《泰和會語》之「論治國學先須辨明四點」，載於劉夢溪主編、馬鏡泉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致謝忱！我做事本來馬虎，錯誤疏漏一定還有不少，祈四方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已簡單交待完畢，就此打住！

辛卯上元，火盆陳邨人識於麥望館，

辛卯花朝，再訂於南京隨園

癸巳孟秋廿七日復識於麥望館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引 言 1

壹、《原本玉篇殘卷》引《國語》斲證 19

貳、《切韻》、《唐韻》殘卷引《國語》斲證 81

參、《一切經音義》三種引《國語》斲證 85

肆、《說文解字繫傳》引《國語》斲證 145

下 冊

伍、《廣韻》引《國語》斲證 215

陸、《宋本玉篇》引《國語》斲證 239

柒、《類篇》引《國語》斲證 257

捌、《集韻》引《國語》斲證 273

玖、《韻補》引《國語》斲證 281

拾、《六書故》引《國語》斲證 289

拾壹、《古今韻會舉要》引《國語》斲證 323

結 語 349

附錄 甘肅藏敦煌寫本殘卷《國語·周語下》校記 359

主要參考文獻 401

引言

討論《國語》一書的流傳，北宋宋庠（996～1066）是一位關鍵性的人物，也可以說宋庠是《國語》流傳過程中的一個分水嶺。宋庠和他的弟弟宋祁（998～1061）並稱「二宋」，《宋史》本傳說他「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註1〕今天我們能夠見到的宋庠的集子爲《元憲集》三十六卷，是清人編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

宋庠在《國語補音》自序中說：

庠家舊藏此書，亦參差不一。天聖初，有同年生緘假庠此書，最有條例。因取官私所藏凡十五六本，校緘之書。其間雖或魯魚，而緘本大體爲詳。〔註2〕

從宋庠的自序可以看到，當時所能參照到的《國語》本子就已經有十五六種之多，可是必定還有十五六種之外的《國語》傳本而爲宋庠所沒有參照到的。可見自漢至宋《國語》傳本的數量還是比較多的。但宋庠校定《國語》之後，其他傳本基本湮沒，唯公序本行世。〔註3〕張以仁（1930～2009）云：「公序

〔註1〕〔元〕脫脫等：《宋史》卷二八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第9593頁。

〔註2〕宋庠：《國語補音敘錄》，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據《微波榭叢書》刻《湖北先正遺書》本，第4頁。

〔註3〕在圖書的流傳過程中，有兩次比較大的轉變，一次是漢人整理圖籍，使得整個的先秦文獻有了一個比較規範或者說符合漢人觀念的文本；另一次是宋代印刷術的大發展，使得宋刻成爲文獻學上的善本書。這兩次事件對中國的圖

本定於一尊之後，既失宋緘本之原貌，亦非任何一種公私本之原貌，而只是一種宋庠以爲綜合了各本之長的本子，他可能校好了，也可能精粹的反而沒有保存下來，也可能採用的反而是不高明的，但由於它的獨行於世而使得諸本盡亡，後人想要知道那些可能是由於校勘者之誤解而誤改的皆無從著手，實在是一件難以彌補的損失。」〔註4〕清黃丕烈（1763～1825）得宋明道二年（1033）重刊天聖七年（1029）本之影抄本並據以寫刻行世，纔使得世人共知《國語》有公序、明道二本。〔註5〕

公序、明道之外的《國語》版本包括宋庠所參照的十五六種本子在內因爲失傳，已無從考究，甚至其版本流傳的過程也不能有一個清晰的脈絡。但圖書在流傳過程中，圖書版本的散佚有一個逐漸的過程，絕對不是一下子就

籍流傳與規範無疑是無尚的功德。但是，由於進行圖籍整理的漢人、進行圖書整理刊刻的宋人沒有把其他本子的異文保留下來，使得今人無法清楚先秦乃至宋以前文獻的實際面貌，很大程度上也無法知道今傳宋刻以外的其他本子的面貌，今人即便意識到了中國圖籍流傳過程中有某些失真現象卻無法找到確切的憑依佐證，這從某種角度上說也是一種遺憾，故拙稿《〈國語補音〉版本說略》中有「有宋一代，官私校書不遺餘力，既對以前歷代的古籍進行了一次規模宏大的總結，又爲後世留下了眾多善本。然而宋人理書而宋前之本亡」之慨（見刊於《舊書信息報》2005年8月15日，又以《〈國語舊音〉與〈國語補音〉》的題目作爲附錄見收於拙著《〈國語〉動詞管窺》第312頁～318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註4〕張以仁：〈淺談《國語》的傳本〉，見載於《張以仁語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02頁。

〔註5〕明道本一直行於世，祇是沒有公序本那樣廣泛而已。如黃刊明道本《周語下》：「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明金李澤遠堂本《國語》、清章氏式訓堂本董增齡《國語正義》作「揜」，汪遠孫《國語明道本攷異》云：「《舊音》作『揜』，《補音》云：通作『掩』。」明金李澤遠堂本《國語》、清章氏式訓堂本董增齡《國語正義》作「揜」，張以仁《國語輯證》則云：「《永樂大典》二九七八引作『掩』。」是《永樂大典》所引與明道本同，可以推斷這裏面有兩個原因：其一，《永樂大典》用的是常用字，「掩」比「揜」更常用；其二，《永樂大典》所據爲明道本《國語》。若屬於後者，則明人刊刻都是公序本而《永樂大典》參照還有可能是明道本或者是明道本、公序本之外的版本。當然通過《永樂大典》引《國語》用例的綜合考察，我們認爲《永樂大典》引《國語》例更接近公序本，但是是否就一定就是公序本系列，有沒有可能是公序本之外的和公序本比較接近、和明道本也比較接近的一個版本，今檢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朝鮮活字本爲正統年間之本，即是和公序本、明道本都有較多相同之處的本子，當然從親緣關係上而言，今傳黃刊明道本與活字本更近（關於此一點，可參看拙稿《〈國語〉明本四種校勘記》）。因此對於明道本的脈絡源流恐怕還需要進一步推求考究。

湮沒無蹤。關於這一點可以以《國語》、《左傳》各家注存佚為例。今天我們看到的最早的完整注本祇有韋昭（204～273）的《國語解》和杜預（222～284）的《春秋經傳集解》，但是在韋、杜之前，早有鄭眾、賈逵、服虔等為《國語》、《左傳》作注，鄭、服姑置勿論，此處祇就賈逵（30～101）注為說。賈逵比韋、杜早一百餘年，又是經學大家，在這一百年間的時間段中賈逵注絕對有比較大的權威性和傳播範圍，《後漢書·賈逵傳》云：「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倨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註6〕由此可見賈逵注在當時的權威程度。即便是韋昭、杜預的注問世之後的很多年，賈逵注也還是各訓詁專著和經史訓詁著作的權威參證。這一點可以從唐代的訓詁著作所引通家之說看出來。以各書所引《國語》注為例，《慧琳音義》、《希麟音義》〔註7〕總共引賈逵《國語》注 600 餘處 230 條之多，而引韋昭注祇 2 次 2 條，且其中一條為韋昭《漢書音義》，而且《慧琳音義》引的韋注還很有可能轉引自稍前的《玄應音義》。根據研究，《玄應音義》成書於貞元（627～649）末年，《慧琳音義》成書於元和二年（807）或五年（810），去賈逵、韋昭皆幾百年，可還是以《國語》賈注作為主要的訓詁參證。如果認為這祇是一個個別現象的話，還可以以《文選》李善注為例。根據我們初步統計，李善（約 630～689）注引賈逵注 188 條，引韋昭注 91 條，仍然以賈逵注為主。可見即便韋昭注問世之後的數百年間，韋昭《國語解》仍然無法抵得過賈逵《國語解詁》的風行。

至於為甚麼後來韋昭注卻完整地流傳下來而賈逵注卻湮沒了，這裏面除了偶然性因素之外，應該和學術的傳承有很大的關係。這一點曾經和紹興俞志慧進行過探討。經由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有意識的價值確認」這一觀念的啟發，我認為是政府確立學術規範的有意識認定使得賈亡而韋存。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唐代確立了《五經正義》，其中《左傳》的注取的是杜預

〔註6〕〔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三六，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年點校本，第 1235 頁。

〔註7〕《希麟音義》本不屬唐代，由於統計時沒有單獨把《希麟音義》拿出來，故作一起計算。

的而不是賈逵的，而杜預的注在徵引舊說的時候很大程度上在徵引韋昭《國語解》，這一點，清人洪亮吉（1746～1809）《春秋左傳詁》已經指出了，洪亮吉往往在杜注與韋注相同之處注明「杜取此」或「杜本此」以明韋、杜之間的前後繼承性。韋昭被殺在公元 273 年，杜預的《集解》「比老乃成」（參見《晉書》本傳），公元 278 年杜預代羊祜（221～278）為征南將軍，280 年破吳，284 年以 63 歲而卒，杜預完全有時間和精力參酌韋注申說《左傳》。這樣韋昭、杜預之間就有一種學術上的繼承或者更確切地講是源流關係。既然唐人取杜注，那麼在對待杜預的學術淵源上也應該取韋注而不是賈注。事實上，祇要是想在眾說中確立一說並且讓眾人接受的話，大都要經歷有意識確立、有意識推行暨有意識廢棄、接受者的被迫接受、接受者的主觀認同與接受這樣幾個階段。賈逵注的失傳和韋昭注的獨樹一幟其實就是這樣一種過程的體現。唐代政府選定了杜預注作為《左傳》的正本，並且請孔穎達（574～648）為之作疏，尤其要注意的一點是孔穎達自己習的是服虔《春秋傳》而非杜傳，可是在他們那個時代，整個儒林有一個說法，就是「杜征南、顏秘書，左丘明、班孟堅之忠臣」（《新唐書·顏師古傳》），可見選擇杜注是時代傾向和官方認定，不是學者自己所能左右的。疏之例不破注，事實上就是申杜，這樣，《左傳》這一部經的範本就出來了，《左傳》杜預注的地位得到確立了。然後官方推行，當時也有士子、有學校，包括官方的學校和私學，你要進官方的學術話語體系，你就要接受《左傳》杜預注，這是有意識地推行，帶有強制性。而在接受者則是被迫的，或者講是被動的。這種被動接受的過程一旦成了一種群體性行為而這種行為持續上幾代人之後就會成為一種自然行為，自然行為也就是一種主觀接受和認同了。這樣就完成了賈逵注的淡出過程和杜預注的確立過程。而韋昭的注實際上也就這樣被確立了。《臺大中文學報》的匿名專家和俞志慧曾經提過疑問，會不會是偶然呢？我個人傾向於否認這種偶然性，因為韋昭也注過《漢書》、《小爾雅》等等，今天我們看《國語》韋注的水平並不低，那麼他的《漢書音義》和《小爾雅注》等也不會差到哪兒去，何以那些書就沒有完本呢？另外，鄭玄（127～200）遍注羣經，可是傳下來的鄭注都是《十三經》以鄭注為範本的，如三《禮》的鄭注，而在《十三經》中沒有以鄭注為範本的就沒有完整地流傳下來，如《論語》鄭注等就沒有完本。這裏面體現出中國傳統學術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非學術性因

素的干預，而且這種干預破壞了學術發展流程的完整性和學術本身自身發展的規律性。

再以黃刊明道本的流布為例，乾嘉學者錢大昕（1728～1804）、段玉裁（1735～1815）等一大批學者都說明道本是最好的版本，如段玉裁在黃刊士禮居叢書本的《國語》序中說：「《國語》善本無逾此。」〔註8〕所以汪遠孫（1789～1835）、陳瑒（1792～1850）、吳曾祺（1852～1929）以及晚近的沈鎔（1886～1949）等人為《國語》作注以及今人點校《國語》都選擇明道本為底本。黃刊在嘉慶五年（1800），學者尤其從事《國語》研究的學者已經主動接受了明道本〔註9〕。黃丕烈之後的很多版刻家、官私書局也都在相當範圍內覆刻黃刊明道本，黃刊明道本確實有了很大的流布空間和人群，即便如此，黃刊明道本還是無法抵得過公序本七八百年的流播廣度與影響深度。晚清學者馬建忠（1845～1900）的《馬氏文通》引用《國語》94 條例句〔註10〕，從徵引的例句文字異同上完全可以看出，《馬氏文通》所據的《國語》是公序本不是明道本，直到後來朱起鳳（1874～1948）編纂《辭通》，其《國語》的引例也還是公序本。明道本的真正普及要到王雲五（1888～1979）主編的《叢書集成新編》、《國學基本叢書》和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發行之後〔註11〕，

〔註8〕〔清〕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見載於氏著《經韻樓集》卷八，《續修四庫全書》第1453冊，第74頁。

〔註9〕關於公序、明道二本優劣，楊守敬已言之，其《日本訪書記》云：「自國朝黃菟園士禮居刻天聖明道本，而公序本遂微。不知明道本固有勝公序本處，而公序之得者十居六、七，即如卷一『昔我先王世后稷』，公序本無『王』字，錢遵王、顧千里、汪小米皆以明道本有此字為奇貨，而許宗彥云：『韋解於先王不空，始釋王字，則此唯云『先世』，可知明道本未必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第65頁。

〔註10〕這是根據張萬起《〈馬氏文通〉用例小計》一文中的統計，張文原刊《語文研究》1984年第2期，此處根據張編《〈馬氏文通〉研究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41頁）。我個人也曾進行過《馬氏文通》引《國語》例的統計，並做《〈馬氏文通〉引《國語》例辨正》一文（本文初以《〈馬氏文通〉引《國語》例校札》發布於超星讀書社區，後以本題刊於《學燈》2008年第1期，又作為附錄見收於拙著《〈國語〉動詞管窺》第345～352頁）祇得65例，後來通過瀚堂典藏檢索，也祇得91例。可能我的統計有所疏漏，故以張所統計數據作為參考。

〔註11〕按：王氏《叢書集成初編》本《國語》為小三二開三冊，附黃丕烈《校刊札記》，1937年出版，編號為3680、3681、3682。《國學基本叢書》本《國語》為小三二開一冊精、平裝，後附黃丕烈《校刊札記》一卷、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三卷，1935初版，關於二書頒行大略，拙著《〈國語〉動詞管窺》

這三套叢書都收錄了同治己巳（1869）年間湖北崇文書局重刻的黃刊明道本。由於商務印書館的影響和王雲五主編的這三套叢書的普及與傳播廣度，到這個時候，明道本的普及度大約纔能夠和公序本相抗衡了。1978年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以明道本為底本整理出版了校點本《國語》，此後的《國語》新校點、譯注本莫不以上古本為宗，而字、詞典的引例基本上都出自上古的點校本，如吳文祺（1901～1991）等編著的《辭通續編》、徐中舒（1898～1991）主編《漢語大字典》、羅竹風（1911～1996）主編《漢語大詞典》以及其他的工具資料以及以《國語》為參證的研究著作基本上都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作為參照〔註12〕，這樣明道本在折中的基礎上纔取得獨尊地位，真正的公序系本除了舊刻影印之外，沒有出現過新的點校本，普通讀者已很難見到〔註13〕。從嘉慶五年（1800）到1978年，歷時將近200年。

同樣，從賈逵以來一直到宋庠的公序本問世之間有一個很長的時間過程，在這個時間段中，宋庠校訂《國語》所依據的十五六種《國語》版本理

引言中曾言之，見拙著《〈國語〉動詞管窺》第4、5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另王氏還編有《萬有文庫》，頒行在1929年～1937年，其中《國語》編號為JW10084，葉玉麟選注本，其本亦以明道本為底本。中華書局版《四部備要》亦當是自崇文書局本而非黃刊明道本。

〔註12〕目前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的這個本子也存在兩個版本，拙著《〈國語〉動詞管窺》引言中曾約略言之，此處做一下較為詳盡的說明。這兩個版本之第一個就是1978年點校的本子，於1978年3月印刷第一次，署名為「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由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此時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址在上海紹興路5號；1981年由初次參加點校的徐光烈和吳紹烈分任上下冊做了部分修訂，並於1982年9月進行了第二次印刷，署名為「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組校點」，由江蘇句容印刷廠印刷，此時的社址已經在上海瑞金二路272號。這兩者都在封面上右下題署「上海古籍出版社」字樣。但是我個人所搜集到的1988年上海東方紅印刷廠印刷的本子，為1988年第1版第1印本，發行7千冊，無字數，署名為「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封面和1978年的也不同，封一題「國語」二字比較大且封面綠色無底紋，無出版社署名，右有四獸，自上而下排開，封四正中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篆印一方。目前坊間通行的基本都是1981年修訂的本子。經過粗略對照，1988年出版的這個本子版式、內容和前此出版的《國語》並無區別，至於為什麼獨立版次，則不可知。

〔註13〕公序本祇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金李澤遠堂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影宋刻宋元遞修本等影印本。明道本倒是出了兩種新式點校，其一為齊魯書社2006年出版的鮑思陶點校本；其二為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明潔輯評梁穀整理本。前者大體參照明道本而行（見本書引言部分談論所依據版本部分所記），後者在借鑒上海師大整理本的基礎上加了清人如王引之、俞樾等人的若干條研究成果。

所當然地會被這個時間段中間世的一些書籍引用到。而從宋庠公序本問世到公序本的真正地被認同、其他《國語》版本徹底湮沒也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中，公序本《國語》之外的其他《國語》版本或多或少地一定會被一些典籍引用到。

引用量比較大的典籍文獻無非是類書、小學書和傳注三種。清人《國語》異文辨正和舊注輯佚的著述中更多地運用了類書和傳注。清人進行《國語》異文和舊注輯考的有王懋竑（1668～1741）、王謨（1731～1817）、汪中（1745～1794）、劉台拱（1751～1805）、汪遠孫（1794～1836）、馬國翰（1794～1857）、黃奭（1809 或 1810～1853）、勞格（1819～1864）、李慈銘（1829～1894）、蔣曰豫（1830～1875）〔註14〕等數家，近則有張以仁（1930～2009）《國語斟證》於四部書引用《國語》條目辨析甚多，又有《〈國語〉舊注輯校》對《國語》舊注進行總結性輯錄，另外日本學者新美寬編、鈴木隆一補的《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輯錄《國語》舊注也復不少，參證資料比較繁富。下面是各家《國語》舊注輯佚的引據資料以及輯佚所得條目數量的基本情況〔註15〕：

〔註14〕 蔣曰豫的《國語》輯錄資料我個人並沒有見到，這裏根據孫啓治、陳建華編《古佚書輯本目錄》所著錄，孫、陳《目錄》為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其他各家分別見〔清〕王謨：《漢魏遺書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200冊，第185～194頁。〔清〕黃奭：《子史鈎沈》，《續修四庫全書》第1209冊，第580～612頁。〔清〕勞格：《讀書雜識》，《續修四庫全書》第1163冊，第255頁。〔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9～2971頁。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4頁。張以仁：《國語舊注輯校》，見載於氏著《張以仁先秦史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346頁。日本學者新美寬編、鈴木隆一補《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8年版，本處用網絡在線版，路徑為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eda/edo_min/edo_bunka/syuitu.html。劉師培：《劉中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0～1222頁。另據陳鴻森考證，清人臧庸、陳鱣亦有《國語》舊注輯佚之作，因未曾刊刻，故亦未見有傳本遺世。

〔註15〕 當時進行統計時並未見張以仁《〈國語〉舊注的輯佚工作及其產生的問題》（見載於《張以仁語文學論集》，第203～227頁）一文。今見張先生的文章，其中統計與我的統計不盡相同。另外，蔣曰豫的舊注輯佚我沒有見到，而王仁俊以及日本學者新美寬等的輯佚張以仁的論文也沒有提及。今錄張先生對各家《國語》舊注輯佚條目的統計如下：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鄭眾5條，賈逵267條，虞氏36條，唐氏94條，孔氏45條；王謨《漢魏遺書鈔》輯賈逵200條，唐固45條；黃奭《黃氏逸書考》輯鄭眾17條，又附錄12條，賈逵200條，唐固87條，附錄18條，王肅8條，孔晁47條，附錄9條，虞

輯佚者	書名	注者	條數	材料來源
王謨	漢魏遺書鈔	賈逵	197	《文選注》、《史記集解》、《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國語解》、《經典釋文》、《初學記》、《後漢書注》、《書正義》
		唐固	37	《國語解》、《史記集解》、《藝文類聚》
勞格	讀書雜識	賈逵	2	《文選注》
黃奭	黃氏逸書考	賈逵	201	《國語解》、《文選注》、《史記集解》、《史記索隱》、《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後漢書注》、《經典釋文》
		鄭眾	30	《國語解》、《文選注》
		唐固	105	《史記集解》、《初學記》、《太平御覽》、《國語解》、《史記索隱》、《禮記正義》、《文選注》、《詩正義》、《孟子疏》、《國語舊音》
		王肅	8	《左傳正義》、《史記集解》
		孔晁	55	《國語舊音》、《詩正義》、《太平御覽》、《左傳正義》、《禮記正義》、《周禮正義》
		虞翻	31	《國語解》、《初學記》、《史記集解》、《水經注》、《玉海》
馬國翰	玉函山房輯佚叢書	賈逵	277	《文選注》、《一切經音義》、《史記集解》、《禮記正義》、《國語補音》、《玉篇》、《北堂書鈔》、《太平御覽》、《開元占經》、《左傳正義》、《後漢書注》、《書正義》、《初學記》、《列子釋文》、《通志》、《廣韻》、《經典釋文》
		鄭眾	5	《國語解》、《詩正義》
		虞翻	36	《國語解》、《初學記》、《左傳正義》、《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水經注》
		唐固	94	《史記集解》、《國語解》、《國語補音》、《詩正義》、《後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
		孔晁	38	《國語補音》、《左傳正義》、《經典釋文》

翻 31 條；蔣曰豫《蔣侑石遺書》輯賈逵 236 條，鄭眾 20 條，虞翻 23 條，唐固 65 條，孔晁 17 條；汪遠孫《國語三君注輯存》輯鄭眾 5 條，賈逵 322 條，王肅 11 條，虞翻 29 條，唐固 77 條，三君注 12 條，服虔 11 條，孔晁 47 條，注 75 條，說 13 條，或曰 1 條，呂叔玉曰 1 條。此為張先生統計各家《國語》舊注輯佚條目。在具體數據上，和我的統計不盡一致。然前輩學者之精細仍可見一斑，故錄存以致敬仰之意。